

張  
黃  
錦  
淵  
郎  
泉  
編

中國近六十年來圖書館事業大事記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書局影印  
新編  
卷之三

中國古代土木工程名著集成  
卷之三

中華書局影印

張錦郎  
黃淵泉編

中國近六十年來  
圖書館事業大事記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八月初版

中國近六十年來圖書館事業大事記一冊

定價新臺幣七十元正

編者 張錦  
黃淵郎  
泉

版權印翻  
有所必究

發行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印刷所及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〇一三號

## H 序

英文 Chronology 一詞，中文譯爲年表或年代表，係指以年代爲經，以史事爲緯，有助於查索史實之工具。其功用是在提綱挈領，執簡馭繁，將重要歷史事件依時序排列。Alfred Mayer 在所著 *Annal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Cassell, 1949) | 書序言中曾指出年表爲研究歷史之一必須的工具。Helen R. Keller 在所編 *Dictionary of Dates* (Macmillan, 1934 ) | 書中亦曾強調：「缺乏可資採信的大事年表，將使歷史渾沌不清」，由此可見，年表對於歷史研究之重要性。

「中國近六十年來圖書館事業大事記」係一記錄我國新圖書館運動重要發展之大事年表。緣以我國新圖書館運動雖發軔於遜清，但配合新教育制度而謀普遍發展者則在民國成立之後。六十年來，我國圖書館事業在政府當局之提倡與圖書館界同仁之努力下，業已奠立一良好基礎，其成效雖難與其他先進國家比擬，但在國步維艱情況下已屬不易。因此，就我國圖書館事業重要大事，選錄排比，輯印成冊，一方面可供備研究圖書館史者之參考；另一方面亦有助於圖書館界同道瞭解發展之軌跡，期能檢討過去，策勵來茲。

有關圖書館大事年表之作，英國有 John L. Thornton 於一九四九年編印 *The Chronology of Librarianship* | 書，由倫敦Grafton 公司出版，並已繹版。美國有 Josephine M. Smith 於一九

六八年編印之 A Chronology of Librarianship 一書，由繼傑西 Scarecrow 公司出版，內容溯自公元一世紀至一九六〇年止世界各國圖書館事業大事。新近出版者則有美國華盛頓天主教大學圖書館安敘較 Mrs. Elizabeth W. Stone 所編輯之 Historical Approach to American Library Development: A Chronological Chart 一文，於一九六七年五月刊於伊利諾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出版之 Occasional papers 第八十二期。內容包括自一六二九年起，至一九六六年止美國圖書館事業大事，所有資料分為：公共圖書館、聯邦及專門圖書館、教育、技術、出版品及專業活動等六欄，分年記事，足供研究美國圖書館史人士之參考。

至於我國過去出版之圖書館大事年表，最早有桂質柏所編之「中國圖書館沿革表」，發表於民十九年六月出版之圖書館學季刊，繼之有呂紹虞編之「中華圖書館大事記」，發表於民廿八年四月出版之中美周刊，以後則未見有類似著作出版，故本編亦為適時之作，足以彌補以上歷著之不足。

編者張錦郎、黃淵泉兩位先生，專攻圖書館學，畢業後在國立中央圖書館服務，工作之餘對圖書館學之研究孜孜不倦，著述頗豐。編者對資料之蒐集，遍及本省各大圖書館，而分析查證更不厭其煩，深信此著之出版當有益於圖書館學之研究。茲值付梓，謹為介紹，並表敬意。

民六十二年四月廿六日王振鵠序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 喬序

民國六十年，有很多慶祝活動，和紀念論文集出版，以祝賀建國已歷一甲子。當時我很想就六年來圖書館界所發生的大事，編一年表。可是始終沒有着手去做。到去年夏天，眼看這件事沒有希望由我來做得成，而又覺得這件事不可不做，便把這一構想，向勤於著述的張錦郎、黃淵泉兩兄談起，誰知話還未說完，淵泉兄就拿出一個抽屜，把其中卡片抽給我看，正是六十年來圖書館界的紀事，已是積稿逾尺了。並說錦郎兄所蒐集的材料，也有那麼多。原來他們兩位在六十年初便分頭找材料，做卡片，雖已有了那麼多的材料，可是仍覺不能滿意。然而中國圖書館學會爲了紀念成立二十年，打算在會刊上發表這批資料，祇得一方面從事增補未備，一方面就要着手寫成初稿。我在欽敬之餘，說出我所見到或想到的資料，都已爲他們查閱過，想找而還未找到的，如柳詒徵的「國立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小史」，我手頭有影印本，便借給他們查閱。在撰寫初稿過程中，錦郎兄有時和我商討體例。所後來在圖書館學會會刊中，刊布時，前言裡列有賤名，說來是很慚愧的事。

前稿發表後，錦郎、淵泉兩兄仍鍥而不舍，一方面繼續查閱文字資料，一方面把印本寄給圖書館界的前輩們，請他們訂正。不一年，所得到的材料又已不少，並增撰了前編，洽請商務印書館出版，

不久就可以問世。而我曾有幸先讀過原稿。且略記我讀後的感想。

我國文化，源遠流長，所存史料，特別豐富。對文獻的保存，早就注重。如本書前言所述，殷商甲骨，排列有序，實為我國圖書館事業的始基（也許還有更早的史實，還沒有為我們發現）。老子為舉世公認的最早的圖書館長。此後的圖書館事業，代有因革。到了近世，受到西學影響，圖書館事業「用夷變夏」，幾乎到了全盤西化的地步。而我中華民族對人類圖書館事業的貢獻，僅就發明造紙和印刷術而論，已稱得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似已為我們忘却。

關於這些歷史，我們亟需一部圖書館史來寫個清楚。圖書館史不是沒有人寫過，祇是有的太簡略，有的僅記一時或一事一館，自不能令人滿足。

大抵海禁未開以前，我國的圖書館事業史，雖然遠沒有較滿意的專著。而如清葉昌熾藏書紀事詩、近人葉德輝書林清話、陳登原古今圖書聚散考、蔣元卿校讎史略、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等，都多少寫到一部分，再參考散見於其他史籍中的資料，當可寫出部上古到近世的圖書館史。

至於近代的圖書館事業，沿襲我國舊制的地方，遠不如受西洋的影響大，在這「用夷變夏」的過程中，值得注意的地方很多，如果不及早留下一翔實的紀錄，將來想寫這一時代的圖書館史，勢必比寫前代的更困難。

因為現代的學術演化，千頭萬緒，且又各守壁壘，少相統攝。我會為了查考錢唐丁氏善本書室的書，歸於江南圖書館的年月，翻了若干以詳明著稱的近代史料，不但不着一字，而且發現他們對於圖

書館有關事項，都不會提到。東方雜誌每期有大事記，固不記圖書館方面的事。就是教育雜誌，也絕少記載圖書館的大事。

至於圖書館界本身的刊物和專著，所存資料也很零星而欠完整。圖書館學季刊、國立北平圖書館刊、江蘇省國學圖書館年報、東海大學圖書館學報，都祇出了十一年，且紀事部分或局限一館，或無紀事欄。其他有關圖書館刊物的壽命更短。祇有圖書館協會會報，出了二十多年，然紀事也未能周詳。至於在論著裡找圖書館史料，更如沙裡淘金。在臺灣重印的舊著，且有刪易序跋，以致找不到出版年月的情形。我們由本書引用資料種類之多而所得有限，便可以想見。

愈是如此，愈見圖書館史，尤其是近世圖書館史，更有及早撰寫的必要。寫圖書館史的方法很多

，可從時、地、人和事各個不同的方面著手。

我在六十年春，曾寫了一篇「柳翼謀先生傳略初稿」，刊在國語日報書和人雙周刊第一五二、一五三兩期。此後想找幾位近代在圖書館事業上有重大貢獻的人來給他們作傳，如能寫出十多篇，也可算近代圖書館人的小史。柳氏之後想寫梁任公，梁氏的著述和傳記資料太多，想從其中找出和圖書館有關的，一一查閱，頗費時日，單是找材料，未必像找柳氏的傳記資料（很貧乏）那麼容易。後來想先寫梁任公的目錄學，也未能完稿。

一館的歷史，雖然各館的概況，或若干刊物中時有記述，然多很簡略。能詳明如國學圖書館小史般的，屈指可數。

現在各級學校，多從事於校史的撰述、校史史料的蒐集與保存。圖書館以蒐集、整理和運用圖書文獻為職志，對本館的歷史記述，似不可落人之後。至於已改制或停辦的圖書館，不少當事人還在，可用回憶錄式來寫出，無論館以人傳，或是人以館傳，都是佳事。

記事方面的，如前述藏書紀事詩等，所述既不周備，在時間上也祇或截至清末，晚些的，也祇到抗戰前。近幾十年也偶有接續前人的論著，然以材料蒐集不易，自難周詳。

若干圖書館刊物，每附有大事記，可算是記時的圖書館史了。然或斷或續，不能相銜接。民國初年和抗戰期間，尤多缺略。

現在有了本書，不僅如書名是六十年間的紀事，若干經始於清末的圖書館，於第一次在本書出現時，都追述了創建的經過。在編年中寓有紀事本末的體裁。近世西化了的圖書館發展史，具見於本書。前編所述，則是清中葉以後的圖書館簡史。而順序雖按年月排列，其中紀事則遍及圖書館事業的各個門類。這由所索引分了圖書館法令、國立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圖書館教育等項可知。至於人物，雖限於體例，不能記其生平。然六十年間對圖書館事業有貢獻之學人，都已隨記事而列名其中。正如清章學誠在文史通義裡說：紀傳之史，本衍春秋家學，而通鑑即衍本紀之文，而合其志、傳為一也。而不僅像唐劉知幾史通裡所說的：夫春秋者，繫日月而為次，列歲時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

至於一件事的原委，在不同的資料中記載有出入的，除了酌繫於某一年月下，必將另一說法附記

其下，採用通鑑者異的辦法。每項資料，必詳注來源，以便覆按，這又是採用現代西洋人著述的法子。所以本書排比六十年間圖書館界大事的方法，是極其嚴謹的。

本書對我，也有不能滿足的地方，便是索引中沒有人名一項。記事的文字較長，且發生年代，大致可知，找起來還不難。至於人名，祇有兩三個字，而且一個人往往牽涉到很多事情裡，如沒有索引，很不容易找得齊全。這一需要，當不止於我打算寫圖書館人物傳記才會有的。

圖書館史，還得圖書館界同人齊心協力去寫。本書可算是一個開端。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十一月望雲樓主人喬衍培謹序

## 自序

中華民國自開國以來，到現在剛好過了一個甲子，在這個不算短的日子裏，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已獲得有識人士的關切和重視。這段時間，直接或間接對圖書館事業有所影響的人、事和物，將來都不免羽化登仙和事過境遷。但是無論如何，他們在中國圖書館事業的宇宙裏，已留下可以看到的光的軌跡和可以聽到的聲的樂章。

我們在這裏，嘗試著用大事年表的體裁，把它記錄下來。我們記錄的是事實（或者說同事實），盡量避免作主觀的價值論斷，文字幾乎照原資料抄寫，不再作雕龍的工夫。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經過這一番整理，把這段史實保存下來，為將來研究這段中國圖書館史的學者，提供一些新鮮的素材。

編輯的工作，從民國六十一年五月初旬開始，到當年十一月底，完成初稿。共一千二百餘條，刊登在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第二十四期（臺北市該會，六十一年十二月三日出版）。接著又陸續增補、考訂，到民國六十二年四月底，才大致完成。內容增易大約占三分之一。五月八日拜訪前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蔣慰堂先生，從他那邊獲益很多。蔣師教我們增寫一篇前言，綜述清季圖書館事業史做為楔子，並翻閱二十五年來冰封的國立中央圖書館舊檔案，這些檔案是中央圖

書館從大陸搬來完整的舊檔，共十二大箱。直到五月底才把它們大略消化，也增補了不少資料。我們特別感激慰師給我們的耳提面命。

我們很感謝王振鵠先生給我們的指導和序文，而幾位女士、先生，在編輯的過程中，給我們善意的指教，惠借資料和給予工作上的便利，現在把他們的芳名寫上來，以表示我們的敬意和謝忱。他們是國立中央圖書館的林愛芳主任、劉崇仁主任、劉兆祐先生、丁仁彪先生、涂瑞鵬先生、王國昭先生；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屈萬里所長、朱仁祀先生、楊慶章先生；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昌彼得處長；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喬衍培副教授、臺灣省臺中圖書館宋新民館長，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薛茂松先生、谷寒松先生，美國哈佛燕京社于鏡宇先生。此外，我們更感謝所引用資料的原始作者。如果本書對於中國圖書館事業有些微貢獻的話，他們才是最大的功勞者。

我們也謝謝中國圖書館事業的先進王雲五老先生和他領導的商務印書館，給本書出版的機會。

編者 張錦郎  
黃淵泉

民國六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於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

## 凡例

- 一、本書記民國元年一月至六十年十二月底關於中國圖書館事業重大事件，計一千二百六十八條。
- 二、本書取材之範圍，包括：圖書館之法令、制度、標準、設館、建築、教育、技術（包括分類法之創編、編目規則、聯合目錄、國際交換協定、館際互借、索引摘要之編製等）、重要圖書館書刊之著述及出版、重要會議及統計、人物動態、圖書館學協會及其專業活動等。凡與圖書館有密切關係之目錄學、出版業、公私圖書目錄之編纂等亦摘要紀載。
- 三、我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發軔於清末，另撰前言，弁於卷首。又凡成立於清末之圖書館，行文首次提及時，特予說明。關於圖書館之成立時間，勢難悉錄，祇載其歷史悠久，較具規模，閱覽人數及書籍流通較多者，或有特殊之設備與藏書者。凡圖書館之「開辦」「開館」「成立」「揭幕」「落成」等，並據所見資料徵引，不加潤飾損益。
- 四、本書之排列，以年月日為序，其有年月日可查者，即排於某月某日，有月無日者排於該月之後，無月無日者，則排於該年之後，凡同年月日者，但於第一次說明，餘省略。
- 五、本書內容採自他書，取材皆註明來源，並詳載書刊名稱及卷期頁數，以便查考。凡事有多種說法

或一事出於數處者，均分別註明。引用文獻，臚列書後，本書只記簡稱，如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作「一教」，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作「學報」，以省贅累。

六、本書編者挿註之按語，用方括號註於條目之下，以資識別。

七、本書爲便於檢查，附編索引，計分：圖書館法令、國立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專門圖書館、圖書館教育、重要分類法及編目規則、圖書館標準、圖書館協（學）會、國際會議及其他等十一類。每類復酌分細目。每條排列之先後，或先舉全國性，後列各省縣市；或依筆劃多寡，或依年代先後。每條後所載阿拉伯數字爲年月日，以利查閱正文。如：14—4—25，即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53—秋，即五十三年秋季。

八、本書以時間倉促，材料缺乏，遺漏舛誤之處，自所難免，祈海内外專家審加教正，俾日後增補修訂，實爲銘感。

九、本書之編輯，民國元年一月至三十八年底政府播遷來臺前由張錦郎執筆，民國三十四年十月臺灣光復至六十年十二月底由黃淵泉執筆。

# 前　　言

## 一、近代圖書館的發軔

我國近代圖書館之發軔，始於清末初期的變法運動。

自甲午（一八九四年）一役，泱泱大國，以二十一省之大，四萬萬之衆，見辱於扶桑三島，士大夫乃悚然驚醒。梁啟超說：「喚起支那四千年之夢，實甲午一役始也。」又說：「支那一經庚申圓明園之變，再經甲申馬江之變而十八行省之民猶不知痛癢，未嘗稍改其頑固囂張之習，直至臺灣既割，二百兆之償款既輸，而鼾睡之聲乃漸驚起。」康有爲亦說：「非經甲午之役，割臺償款，創巨痛深，未有肯翻然而改者。」慘敗的教訓，已恍然大悟：國家富強之道，不在船堅砲利，不在工藝製造。因此，亟亟於謀求根本的變法圖強。「中國今日非變法不能為治，稍有識者莫不知之」。首先將變法的希望，寄託於朝廷，企能為政治革新的發動力，後因「望變法於朝廷其事甚難」「退而倡之於下，以喚起國民之議論，振刷國民之精神，使厚蓄其力，以待他日之用」，事實上「……風氣未開，人才未備，一切新政自無實行」。其變法主張為從振興教育、作育人才、開通民智着手。具體措施不外：設學校、開報館、建藏書樓、勵學會等。

如：清光緒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孫家鼐奏辦官書局，第一條爲設藏書院，「……尊藏列朝聖訓欽定諸書，及各衙門現行則例，各省通志，河漕鹽釐各項政治，並請准其咨取儲存庋列其古今經史子集，有關政學術業者，一切購置院中，用備留心時事，講求學問者，入院借觀，恢廣學識……」第二條爲設學堂……。

同年五月二日，禮部尚書李端棻奏請變法，疏請於京師建立大學堂，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並主張應行推廣者，約有五端：一曰設藏書樓、二曰創儀器院、三曰開譯書局、四曰廣立報館、五曰選派游歷。其論藏書樓事稱：「一曰設藏書樓。好學之士，半屬寒酸，購書既苦無力，借書又難其人，坐此固陋寡聞，無所成就者，不知凡幾。高宗純皇帝知其然也，特於江南設文宗、文淮、文瀾三閣，備庋秘籍，恣人借觀。嘉慶間大學士阮元，推廣此意，在焦山、靈隱起立書藏，津逮後學。自此以往，江浙文風甲於天下，作人之盛，成效可睹也。泰西諸國，頗得此道，都會之地，皆有藏書，其尤富者，至千萬卷，許人入觀，成學之衆，亦由於此。今請依乾隆故事，更加推廣，自京師及十八省省會，咸設大書樓，調殿版及各官書局所刻書籍，暨同文館製造局所譯西書，按部分送各省以實之。其或有切用之書，爲民間刻本，官局所無者，開列清單，訪明價值，徐行購補，其西學書陸續譯出者，譯局隨時咨送，妥定章程，許人入樓看讀，由地方公擇好學解事之人，經理其事，如此，則向之無書可讀者，皆得以自勉於學，無爲棄才矣。古今中外有用之書，官書局有刻本者，居十之七八。每局酌提部數，分送各省，其費至省，其事至順，一奉明詔，事卽立辦，而餉遺學者，增益人才，其益蓋非淺鮮。